



从“四化同步”到“五化协调”

简新华 杨 冕

摘要: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东部已经开始以服务业为主导,全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已经快于制造业,表明中国开始由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经济服务化开始成为产业结构演进的大趋势,所以应该适时把“四化同步”调整为“五化协调”,把服务化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主攻方向之一,而且把“同步”调整为“协调”。

关键词: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服务化;城镇化;信息化

中国196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包括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现在提出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则是所谓“新四化”。这两个“四化”在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或主要任务,区别只是“四个现代化”包含国防现代化,而“新四化”则根据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当前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把现阶段工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明确为工业化,把科学技术现代化具体化为信息化,而且由于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特别明确提出了城镇化,纠正了以往忽视城镇化的偏差。

近些年来,由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滞后于人口非农化和土地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工农和城乡也还没有实现信息化,而且这种“新四化”的不协调同步,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的主要表现之一。所以,我国特别强调要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但是,从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大趋势和目前出现的新情况来看,中国已经开始由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转变,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已经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演进,经济服务化(由制造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也是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任务,所以中国现在应该适时把“四化同步”调整为“五化协调”,把服务化也作为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主攻方向之一,把“同步”调整为“协调”,这样的方针才更为准确合理,更有利于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高效发展。

一、“四化同步”的标志、必要性和现状

所谓“四化同步”,应该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推进的速度要适当,实现协调平衡发展的状况,其中如何一化都不要太快、过于超前或者太慢、过于滞后。我认为,提“四化协调”可能比“四化同步”更为准确恰当。因为,什么叫“同步”,不太好严格准确判断,容易产生误解,会让人们理解为同时以相同速度发展、发展程度也一样。但是,“四化”发展的先后、速度和程度总会存在一定的差别,要求速度和水平完全一样、“齐步走”,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达到,所以“同步”的提法可能不太准确;相反,“协调”更接近

实际、更好把握、更为准确。所谓“四化协调”，就是“四化”的发展状况、速度、水平互相适应、相互促进、协调平衡，既不过分超前，也不严重滞后。实际上，“四化同步”与“四化协调”的内涵应该是一致的。

（一）“四化同步”或“四化协调”的标志

具体而言，“新四化”协调平衡发展的主要标志应该是：

工业化能够有效推进城镇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为农村提供必要的技术、设备和资金，切实带动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健康发展，适应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状况和要求，既不超前也不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农民的非农化与城镇化同步实现，没有产生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工业和城市适时反哺农业和农村，真正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农业产业化、机械化、规模经营水平、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工农、城乡差别逐步缩小直至消失；尽可能发展信息产业，运用信息技术和设备改造和武装工业、农业和城乡，使得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融合，跟上全球信息化的步伐。

（二）“四化同步”或“四化协调”的必要性

“四化”都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相互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只有互相协调配合，才能互相促进、相辅相成、有效实现；否则，“四化”推进不协调、差距太大，就会互相制肘、互拖后腿、难以成功实现。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促进器，二者必须协调发展、平衡推进。如果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就会使得工业发展缺乏市场和条件，从而延缓工业化的进程，无法实现发达的工业化；如果工业化滞后，城镇化超前，则会形成“过度城镇化”，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带来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城镇化必须依靠产业支撑，否则就是“唱空城计”，会造成“过度城镇化”。没有产业的发展 and 集聚，无法提供推进城镇化所必须的人口、就业机会、资金，即使依靠行政的力量，人为增加城镇人口，进行城市建设，搞“房地产化”，也不可能长久持续，甚至可能出现“鬼城化”。

农业的一定发展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前提，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必然趋势、能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如果没有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会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经济技术条件缺乏，农业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假若农业现代化滞后，也会使得工业发展缺乏市场和条件、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劳动力和土地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从而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后腿；还可能大量贫苦农民盲目涌进城市，也会形成“过度城镇化”、“贫民窟化”，带来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而且，城镇化不仅是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过程，同时还是城市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普及、工农和城乡差别逐步缩小以致消失、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的过程。如果城镇化只是城镇的土地面积和人口增加，没有相应的城市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的普及、工农和城乡差别的缩小及农业现代化的推进，甚至把城镇化搞成剥夺农民、损害农民利益的过程，那就是一种极为有害的病态城镇化。根本解决中国突出的“三农问题”，仅有农业现代化是不够的，更离不开工业化和城镇化，必须依靠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平衡发展。

信息化是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生活方式演进的大趋势，没有信息技术和设备的武装和改造，也就没有现代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信息化能够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更快更有效地实现；而工业化和城镇化又是信息化兴起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并且，包括信息技术产业、信息内容产业、信息服务产业在内的信息产业是信息化的基础，信息产业是新兴产业，信息产业的发展和信息化同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一样，也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大趋势和优化的重要内容（周宏仁，2008：97）。

而且，尽管“四化”的发展有先后、速度和程度的差别，不可能“齐步走”，但“四化”都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四者缺一不可，只有最后同时都实现了，现代化也才能最终实现。其中，任何“一化”的任务没有完成，都不能说实现了现代化。所以，“四化”必须协调、平衡发展，最后同时实现。

（三）“四化同步”或“四化协调”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了“新四化”的进程，极大地提高了“新四化”特别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水平。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027.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2年52374亿元人民币，增长了约50

倍;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745.2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2年的235162亿元人民币,增加了133倍多^①。中国信息化包括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更是从无到有、突飞猛进。比如:截止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有5.1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远远超过23.8%的世界平均水平(周宏仁,2012:5)。

图1和图2表明:从1978—2012年,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在多数年份是最快的,最高的是1992年的21.2%,35年中也有17年低于第三产业,2012年是7.9%,低于第三产业0.2%;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始终是最高的,都超过40%,最高年份达到48.2%,2012年为45.3%。第一产业的增长速度,除了1981—1982年高于第二产业、1990年高于其它产业之外,都是最低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28.2%逐步上升到1982年33.4%的最高点,以后逐年下降到2012年的10.1%,1985年开始一直是最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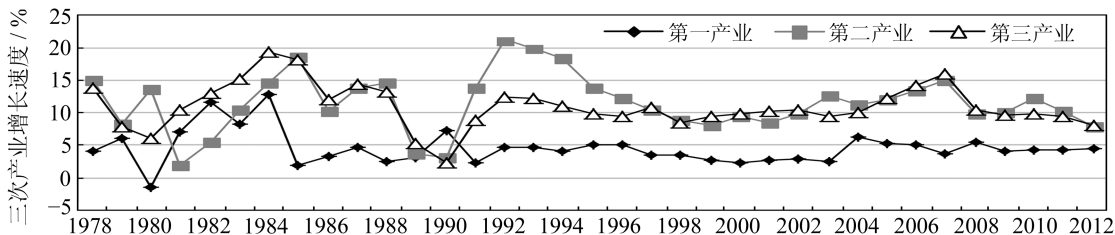


图1 1978—2012年中国三次产业增长速度比较图

资料来源:1978—2011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2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关于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实的公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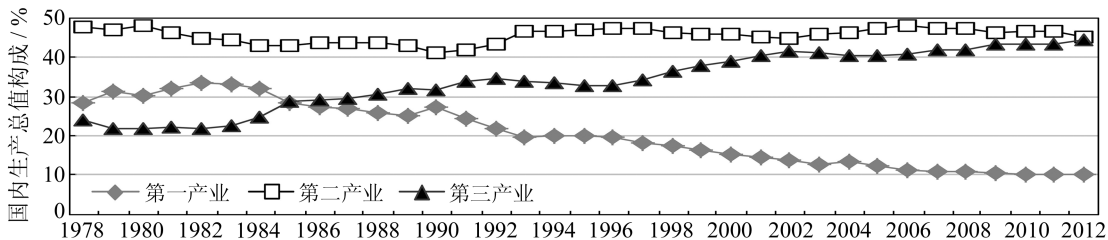


图2 1978—2012年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趋势

资料来源:1978—2011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2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关于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实的公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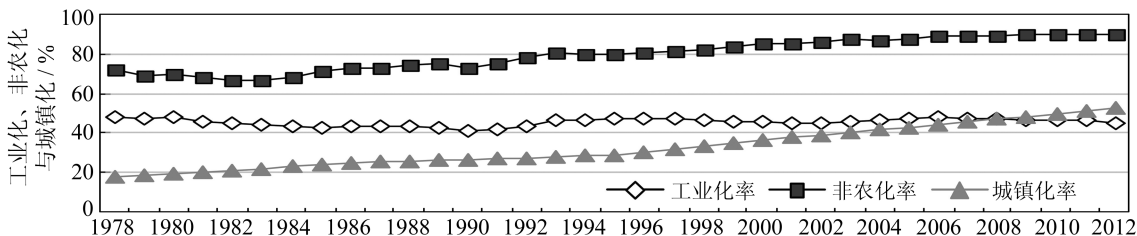


图3 1978—2012年中国工业化、非农化与城镇化水平变动趋势比较

资料来源:1978—2011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2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关于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实的公告》。

图3表明:从1978—2012年,中国工业化率(工业产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一直在40%—50%之间波动,没有较大的变化,但必须看到的是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33倍多,更要看到的是中

^①1978—2011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2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关于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实的公告》。

国的非农化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也是反映工业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已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已经由1982年改革开放中的最低值66.6%上升到2012年的89.9%;城镇化率则由1978年的17.9%大幅度上升到2012年的52.6%,每年平均提高约1%,这是人类社会城市化发展史上少见的高速度。

从“新四化”的相关关系来看,工业化极大地推动了城镇化,改变了城镇化长期严重滞后的状况,城镇化也有效促进了工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农业现代化、为信息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新四化”目前存在不协调、不平衡、不同步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依然比较落后。综合农业现代化指数由1980年的29提高到2008年的38,而在世界的排名则由1980年的60位下降到2008年的65位,世界第一的丹麦综合农业现代化指数2008年是100(何传启,2012:297)。农业机械化程度、农业劳动力比重、农业劳动生产率、城乡收入差距是衡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农业机械化率90%左右、农业劳动力比重不到10%、工农和城乡差别基本消失。2011年中国的综合农业机械化率则是54.8%,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依然高达34.8%左右。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低约10倍,约为世界平均值的47%,约为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2%,约为美国和日本的1%(中科院,20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6977元,前者是后者的3.126倍。而且,2012年与1978年相比,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约50倍,第二产业则增加了133倍多,第三产业更是增长了约264倍多,这说明工农、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现在的农业现代化落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存在另一种类型的“半城镇化”(城市和工业先进的生产方式在农村和农业的普及程度较低),极不利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更需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第二,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滞后于人口非农化和土地城镇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非农化率(即在二、三产业产值和就业人员的比重)高达90%以上,城市化率80%左右。2011年,中国按照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计算的工业化率是46.8%、非农化率是89.9%,按照就业人员比重计算的工业化率是29.5%、非农化率是65.2%;按照包括进城农民工在内计算的城镇化率是51.27%,按照城镇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只有不到40%。由此可见,中国现在的城镇化水平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水平(也就是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非农化),依然需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中国2012年52.6%的城镇化率是不完全的、有“水分”的,其中包含有部分“半城镇化”的人口。2012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亿人,如果完全扣除这1亿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只计算城镇户籍人口,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就只有不到40%。虽然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严重滞后的状况有了非常大的改观,但由于城镇化的不完全或质量不高,使得中国依然没有根本改变城镇化滞后的状况,人口城镇化仍然滞后于人口非农化,还必须通过提高城镇化质量来加快城镇化步伐、推进健康城镇化。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是51.27%,比2010年提高1.59%;2011年全国批准建设用地61.17万公顷,其中转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41.05万公顷,转为建设用地的耕地25.30万公顷,同比分别增长26.3%、21.6%、19.4%。据报道,改革开放以来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我国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4倍,但城镇人口只增加了1.6倍(何欣荣、叶锋,2011)。据有关研究,中国现在有数以千万计的“三无农民”。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现在农地城镇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农地非农化和城镇化的提高速度要比农民非农化和城镇化的提高速度快得多,说明现在城镇化占地增长过快、过多、利用效率不高,也不利于城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

第三,信息化水平还不高。从国际上衡量信息化发展状况的三个重要指标来看,中国在世界的排名比较靠后,而且近10年呈现“先上升、后下滑”的态势。2010年“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的世界排名,韩国第1位,美国第17位,俄罗斯第47位,巴西第64位,中国第80位,虽然比2002年的90位上升了10位,但比2007年的73位下降了7位。2012年“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的世界排名,韩国第1位,美国第

5位,俄罗斯第27位,巴西第59位,中国第78位,比2005年的57位下降了21位。2010年“网络化准备指数”的世界排名,瑞典第1位,美国第5位,巴西第56位,俄罗斯第77位,中国第36位,2011年却下降为51位(周宏仁,2012:324-332)。

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新趋势

(一) 经济服务化的新动向

图1和图2还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也快速发展、比重大幅度提高,尤其是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2012年开始出现新的发展势头。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872.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2年的231406亿元人民币,增长了约264倍多,是三大产业中增长倍数最多的产业;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始终较快,最高达到1984年的19.3%,35年中有34年高于第一产业,有17年高于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1985年以前是最低的,不到30%,除了1978—1980年的比重有所下降之外,以后一直是上升的,1985年开始超过第一产业,2012年达到44.6%的最高点,只比第二产业少0.7%。2012年全国第三产业增长8.1%,超过了第二产业的7.9%;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分别是3.4%、7.8%、8.3%,上半年分别是3.0%、7.6%、8.3%,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最快。而且,中国东部地区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多数是最快的,大城市第三产业的比重有的已经超过50%,实际上已经成为主导产业。比如,2012年一、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北京是3.2%、7.5%、7.8%,上海是0.5%、3.1%、10.6%,广东是3.9%、7.6%、9.2%,浙江是2.0%、7.3%、9.3%。2012年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北京是76.4%,上海是60%,广州63.59%。全国和东部地区的这几组数据表明,东部已经开始以服务业为主导,全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已经快于制造业,这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新动向,也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已见成效的可喜现象!

(二) 经济服务化加快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现在会出现经济服务化的新动向?主要原因是:

第一,经济服务化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趋势。工业化中期主要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阶段,工业化后期主要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阶段,由制造业为主导向以服务业为主导转变则是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趋势。先进地区已经开始以服务业为主导,全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快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接近第二产业,表明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由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转变;也就是说,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开始由制造业为主导向以服务业为主导转变,经济服务化开始成为产业结构演进的大趋势。

第二,城镇化推进的必然趋势。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是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小的决定性因素,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以一定数量的人口集中居住和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为前提条件,只有城镇化和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才能形成对第三产业的巨大需求,服务业才能加速发展,也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比如: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之所以占整个国民经济的70—80%,与其城市化率也达到70—80%、人均GDP达到和超过一万美元是相对应的。中国第三产业长期发展落后,尽管学者、官方近年来一再呼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政府也采取多种举措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可就是不能比制造业更快发展起来、不能成为主导产业,其原因不是由于人们不重视,主要在于城镇化水平太低,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还没有形成对第三产业的巨大的市场需求。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终于超过50%,达到51.27%,2012年再提高到52.6%,表明中国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已经接近或者达到50%以上的世界平均水平,严重滞后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而且每年还在按照1%左右的较快速度推进。城镇化快速推进必将更快更多地产生对服务业的需求,带来服务业的大发展。可以预言,要不了多久,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将很有可能超过第二产业、达到50%,成为主导产业。

第三,增加就业的迫切需要。中国劳动力总量特别庞大,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有9.37亿,即使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会下降,但绝对量还是会相当大,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劳动生产率仍然较低,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相对下降,因此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就业问题依然会比较突出。美国2亿左右劳动力创造的GDP是中国9亿多

劳动力创造的 2 倍多,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现在发展方式不合理、产业结构档次低、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低、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率低,随着中国制度的完善、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技术的进步、管理的加强,劳动生产率将大幅度提高,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逐步大量减少,如果服务业没有相应的发展,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现代服务业还是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多、就业率更高,而且现代服务业更适合于大学生就业,服务业的发展更有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

第四,消费结构升级的必然要求。消费结构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演进升级,而消费结构的演进必然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这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客观规律。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现在超过了 6000 美元,已经达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在这个发展阶段中,消费结构必然要由小康型向发展型、富裕型、享受型转变,由追求丰衣足食向要求提高生活质量转变,人们的消费需求将由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为主转向更多更好的服务为主,中国现在服务业的加快发展正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而且,扩大内需是新世纪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根本之策,内需主要是消费需求,随着物质需求的不断满足,消费需求中增长最快的将是服务需求,自然会推动服务业更快地发展。特别是当前不少物质生产部门产能过剩,而包括老年服务、信息服务等在内的服务业的许多领域却供不应求,更是要求服务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新的主要增长点和支柱产业,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有效供给,更好满足消费需求,改善民生,提高生活质量。

第五,人力资源新优势发挥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发挥劳动力充足价廉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采取优惠政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本,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现在中国人力资源的状况出现了新的变动: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和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逐步提高,中国人力资源充足,但价廉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另一方面,由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大学生数量多、增加快,而且培养成本和毕业后的薪酬也比发达国家低,开始形成人力资本数量大、增长快、价格便宜的新的比较优势,并且还会不断增强。比如:中国大陆计算机软件技术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只有 5.6 万人民币,在香港却能拿到 50—60 万港币,在美国的收入则高达 7 万美元以上(简政,2006)。人力资源这种新的比较优势的形成会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为现代服务业和承接外包等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也是现在中国服务业和外包等服务贸易发展加快的原因之一,2012 年中国高附加值服务中的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广告宣传、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出口快速增长,分别比上年增长 17.8%、18.6%、18.2%、122.5%、40.1%(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2013);另一方面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又能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源的新优势。

第六,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附加值高、收入更多、经济效益更好,比如沃尔玛公司曾经连续数年在世界 500 强中排名第一,主要从事的就是零售业。台湾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先生提出的“微笑曲线”表明,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即高附加值、高收入的环节是上游的研发、设计、采购、供应和下游的仓储、运输、市场销售、售后服务等,而这些环节大多数都是服务业。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和外包等服务贸易的发展,不仅本身就是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内容之一,能够满足国内外对服务业的需求,而且有助于产业升级、进入世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益。服务业还具有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特点,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有助于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三) 必须把服务化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新的主攻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是改变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调整“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落后、服务业太少”的畸形产业结构,在首先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和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加快农业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轻纺工业,重工业速度和比重下降,服务业也加快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主要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的出口加工制造业,服务业也保持较快增长速度;1999 年到 2011 年,出现重新重工业化的趋势,重工业增长最快,在工业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最高达到 70%,同时服务业也保持更快的发展。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于工业化

的中期,产业结构调整演进的趋势主要是发展制造业,先是以轻纺工业为重点,后转向以重工业为重点。2012年全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接近第二产业,首次相差不到1%,而且增长速度快于第二产业,可以说出现了经济服务化的新动向,表明中国开始进入以制造业为主导向以服务业为主导转变的工业化中后期,发展服务业也应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新的主攻方向之一。

三、把“四化同步”调整为“五化协调”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优化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要协调平衡同步推进的主要也是这“新四化”。以上分析表明,我们现在只讲“四化同步”已经不够、不全面、不准确了,遗漏了现在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趋势——服务化。因此,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主要任务还应该加上“服务化”(即服务业发展成主导产业的过程)，“四化同步”也应调整为“五化协调”。

全面已经分析了“四化协调”的必要性,为什么包括服务化在内的“五化”也要协调呢?除了服务化已经开始成为中国产业结构演进新的大趋势之外,还由于服务化与信息化一样,是现代化更新更重要的内容,只有“五化协调”发展,现代化才能真正最终成功实现,实现的才是与世界同等水平的现代化。与没有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一样,没有服务化,只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还不能说实现了现代化。这“五化”虽然都是结构问题,但并不完全是同一个层次上的结构问题,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服务化是产业结构演进问题,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然趋势,城镇化是城乡结构演进问题,主要是人口空间分布向城镇集中和城市先进的生产、交往及生活方式向农村普及的必然趋势。信息化则是技术结构演进问题,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问题。只有“五化”都基本实现,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所以必须同时努力推进,任何一化都不可偏废。

而且,服务化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制造业的产业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主要是生产性服务活动,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极大地促进制造业的优化升级;城镇化是服务化的重要条件,服务业既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又能够成为城镇化新的产业支撑,促进城镇化的持续发展;信息化则是现代工业、农业、服务业和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技术基础,信息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也要现代化,信息化也是整个服务业现代化的重要表现。所以,“五化协调”,能够更好地促进“五化”的有效实现。

为什么不是把“四化同步”调整为“五化同步”,而是“五化协调”呢?如前面所说的道理一样,“同步”容易产生误解,会让人们理解为同时以相同速度推进、发展程度也一样,而“齐步走”不符合“五化”发展的实际也不可能达到,“协调”更接近实际、更好把握、更为正确。所谓“五化协调”,就是“五化”的发展状况、速度、水平互相适应、相互促进、协调平衡,既不过分超前,也不严重滞后。

四、实现“五化协调”发展的战略对策

如何实现“五化协调”呢?现阶段的当务之急,首先应该是加快目前处于滞后状态的农业现代化、人口城镇化的步伐,同时着力推进信息化和服务化,尽可能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服务化中运用信息技术和设备,提高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服务化的技术水平和质量效益,从而实现“五化协调”。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优化制造业内部结构,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进入世界产业价值链高端,生产更多更先进的价廉物美的技术装备,更好地满足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服务化的需要,注重发展环保产业、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进一步合理有效推进工业化(简新华、余江,2009:341)。

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以人为本,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加快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社会保障、就业、土地、住房、教育等制度的改革,合理增加城镇化的投入,着力克服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非农化和土地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中西部城镇化滞后于东部城镇化、城镇建设和管理滞后于人口城镇化等“六个滞后”现象,切实解决“半城镇化”、“被城镇化”、“房地产化”、“棚户区分化”、“大跃进”城镇化、“过度城镇化”、“鬼城”化、“空壳化”、土地城镇化过度、

城镇规模结构不尽合理、“城乡差别扩大化”、“贵族化”城镇化等缺陷,有效提高城镇化质量,积极稳妥推进健康的新型城镇化(简新华等,2013:1)。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深化农村改革,完善现行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实行合理的多样化、兼业化、分工协作专业化的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力度,提高农业机械化、产业化、信息化的水平,延伸农业产业链,推进农产品的深加工,增加农业的附加值,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特色农业、优质农业、高效农业和农村服务业,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简新华,2013:74)。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改革和完善创新制度和机制,增强创新动力,加大信息技术研发投入,扩大信息服务需求,加快发展信息产业和信息服务业,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技术设备生产,尽可能用信息技术和设备武装和改造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和城镇建设及管理,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服务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在全社会普及信息化知识和技能,提高整个国家的信息化水平。

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根本之策是发展教育事业、进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基本途径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增加服务业的市场需求,重要方针是坚持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举、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并举、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为重点,有效措施是实行财政金融支持(包括服务业企业上市、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等)、鼓励服务业创业、增加服务业投入、加强服务业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注重发展服务贸易、深化服务业领域各项改革,增强各类服务业企业活力、拓展服务业发展的新空间、营造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等(简新华,2013)。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2).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 [2] 何传启(2012). 中国现代化报告 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4] 简新华、余江(2009). 中国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道路.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 [3] 简新华等(2009). 中国城镇化与特色城镇化道路.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 [5] 周宏仁(2008). 信息化论. 北京:人民出版社.
- [6] 周宏仁(2012). 中国信息化形势分析与预测.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djusting “Four Modernizations Synchronization” into “Five Modernizations Coordination”

Jian Xinhua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Yang Mian (Associate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tatistics, the growth rate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has surpassed tha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addition, the industry structure in the eastern area in China is even dominated by the service industry, which indicates that this country i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mid-industrialization to the post-industrialization, and servitization would become the general trend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In this context, we should adjust Four Modernizations Synchronization into Five Modernizations Coordination duly, and make servitization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targets in upgrading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 words: industrialization;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servitization; urbanization; informatization

■ 作者简介: 简新华,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湖北 武汉 430072. Email: xhjian@whu.edu.cn

杨 冕, 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D79012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09&ZD025)

■ 责任编辑: 刘金波

